

# 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形式、特徵與影響

孟書強\*

## 一、前言

2014 年的非法“佔中”運動有兩點讓人印象尤其深刻，一是青年人的積極參與，二是新媒體在運動的發起和維繫中所發揮的突出作用。事實上，隨着新媒體技術的迅速發展，香港青年通過新媒體參與政治近年來已經成為常態。無論是在投票選舉等制度化政治參與中，還是在遊行、佔領等非制度化政治參與中，新媒體的身影都隨處可見。除了作為獲取新聞和意見表達的平台，新媒體亦成為香港青年政治參與過程中組織動員的重要工具，並表現出巨大的影響力。

這種常態不僅正在解構香港傳統的政治生態，亦對香港特區政府施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7 年“七一”期間視察香港時所說，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沒有青少年健康成長，國家就沒有遠大發展。<sup>1</sup> 如何增加對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是當前香港社會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然而，目前相關的系統學術研究仍然不多，應該說相關研究已經大大落後於實踐的發展。文章首先簡要梳理香港的新媒體環境及青年使用新媒體現狀，然後結合 21 世紀以來香港青年使用新媒體參與政治的典型公共事件，探討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形式、特徵與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關於青年的定義，不同機構有不同界定，參考各項定義，本文所指青年的年齡範圍是 15-34 周歲。對於何謂新媒體，學界也一直存在各種爭議。筆者無意對其概念界定追根究底，本文所指的新媒體泛指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之後發展起來的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的媒體形態，包括網絡媒體、手機媒體、社交媒體等。對於政治參與的概念，也並無一定之說，本文所說的政治參與泛指任何有意影響公共事務或決策的行為。

## 二、香港新媒體環境與青年的新媒體使用

2017 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0 週年。這 20 年來的歷史亦是一部新媒體迅速發展的歷史。1997 年香港回歸時，互聯網在香港剛剛起步。20 年後的今天，超過 8 成的香港市民使用互聯網，青年則幾乎全部上網。香港青年平均每天要約花 3 個小時使用手機上網。<sup>2</sup> 不同於其父輩，更多只是把新媒體作為工作生活的工具來使用新媒體；對青年一代來說，他們一出生即生長在新媒體環境中，是地道的

\*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媒體星球“原住民”，新媒體已經內化為其生活的一部分。

### (一) 香港全面進入高度發達的網絡社會

經過 20 年來的發展，香港已經全面進入高度發達的網絡社會。使用新媒體的香港市民與日俱增，新媒體在香港輿論格局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特別是以 2008 年來智慧手機的問世和臉書(Facebook)中文版的上綫為標誌，香港新媒體的發展迅速進入Web2.0時代，社交媒體和網絡新聞媒體強勢崛起，成為了影響輿論的重要一極。截至 2016 年 6 月，共有 575 萬人使用互聯網，佔香港總人口 80.2%。<sup>3</sup> 與回歸之初的 2000 年相比，2017 年以互聯網作為主要新聞來源的人上升了 46%，而以報紙作為主要新聞來源的人則下降了近 3 成。<sup>4</sup> 此外，更多的市民也開始通過新媒體收聽廣播、觀看電視。為了順應這種潮流，2017 年香港電視行業的龍頭老大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正式終止收費電視業務，轉攻互聯網電視。

除了使用人群的劇增外，在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力上，新媒體的重要性也已經開始比肩甚至超越傳統媒體。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一項調查資料，香港市民認為在提供信息和娛樂的重要性上，互聯網略低於電視和報紙，但高於廣播不少。接近 6 成市民認為新媒體在提供信息和娛樂方面是“頗重要/非常重要”的媒體。<sup>5</sup> 被稱為第五代香港人的“90 後”接觸新聞最重要的媒介依次為網站、Facebook、電視、免費報紙、收費報紙和電台。此外，來自民間和官方的外部認可也凸顯出新媒體日益增長的影響力。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自香港回歸便開始的“市民對傳媒公信力的評分”追蹤研究，2016 年首次將網絡新聞媒體作為一個媒體大類。2016 年以來，香港立法會、政府新聞處相繼批准網絡媒體到立法會、政府記者會採訪，只要是合法註冊團體，主要從事新聞行業及具原創報導，即可獲發採訪證。

### (二) 香港青年的新媒體使用：全民化、移動化、社交化

相關調查和資料顯示，香港青年的新媒體使用呈現出全民化、移動化、社交化的特徵。所謂全民化，即香港青年幾乎人人都上網。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2016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青年上網率達到 98% 左右。其中，15-24 歲的青年經常上網的比率是 98.5%，25-34 歲的青年經常上網的比率是 97.7%。<sup>6</sup>

移動化主要是指香港青年對智慧手機的高度依賴。香港青年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近 9 成的香港青年擁有智慧手機，每日平均花費 3.5 小時使用手機。超過 7 成的青年入睡前會使用手機，約 5 成青年在吃飯或入廁時仍然使用手機。一半的青年認為外出時不帶手機比不帶錢更缺乏安全感。<sup>7</sup>

社交化主要是指在媒介消費偏好上，以Facebook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成為香港青年最常使用的媒體。接近一半的香港青年以社交媒體作為獲取公共事務信息的最主要來源。<sup>8</sup> 香港青年使用手機時最常用的功能中，社交網絡居第 2 位，僅次於即時通訊。<sup>9</sup> 研究發現，對於一些社會政治議題，社交媒體成為繼年齡、教育、政治取向之外的第四大主要影響因素。<sup>10</sup>

綜上所述，近年來香港青年的新媒體使用呈現出全民化、移動化、社交化的特徵。香港青年幾乎人人上網，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全面融入其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移動社交成為香港青年最青睞的與外界聯繫和溝通的方式之一，這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和豐富了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形式。

### 三、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形式

回歸之前，在殖民統治下，香港青年缺乏政治參與的渠道，大多對政治冷感。回歸以後，港人真正成為香港的主人，政治參與渠道不斷完善，激發了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訴求。新媒體的崛起則為這種訴求的實現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和平台。

尤其是隨着 Web2.0 時代的到來，這些新媒體星球的原住民越來越多地開始通過新媒體參與政治。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形式，概括起來主要包括網絡政治眾籌、網絡政治惡搞、網絡政治群組和網絡政治動員等。網絡政治眾籌即通過網絡新媒體平台籌措政治參與經費，突出表現為一些新冒起的青年候選人通過網絡新媒體平台籌措選舉經費。網絡政治惡搞即在網絡新媒體平台以惡搞的方式回應嚴肅的社會與政治議題，是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表達的突出形式。網絡政治群組即網民為了某種政治目的和訴求，通過網絡新媒體平台建立的網上群組，是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結社的突出形式。網絡政治動員則是意在發起集體行動的更激進的政治動員形式，其促成的行動包括網絡連署、綫下遊行等綫上綫下集體行動。

#### (一) 網絡政治眾籌：新媒體環境下的投票選舉

多項實證研究已經表明了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新媒體對當下世界選舉政治的巨大影響。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接受採訪時亦直言，如果沒有社交媒體，他可能就無法當選總統。新媒體對選舉政治的影響力可見一斑。近年來，新媒體以其廣傳播、低成本優勢，已成為影響香港青年參選、投票、助選等制度化政治參與的重要平台。網絡政治眾籌則是其突出表現形式。一方面，一些新冒起的候選人借助網絡眾籌籌措選舉經費，擴大知名度；另一方面，以往更多作為被動的宣傳動員對象的廣大青年支持候選人眾籌本身就是一種直接表達政治傾向、實現政治參與的過程。

2016 年立法會選舉中，本土派獨立參選人朱凱迪以所在選區最高票當選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然而相對其他候選人來說，朱凱迪在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的曝光率不多，在市民中知名度有限，民調顯示在選舉之初其支持率僅有 2.1%。他最後之所以能成功“逆襲”，高票當選，應該說與網絡政治眾籌不無關係。其選舉經費絕大部分即是通過在其 Facebook 選舉專頁發起的眾籌計劃籌得。通過眾籌計劃，朱凱迪獲得的不僅是捐款，更是知名度和情感連結。因為眾籌的可見性，網民可以輕易知曉捐款的人數和金額，這本身就是一種擴大知名度的無形宣傳。同時，在眾籌過程中候選人與捐款網民間的情感紐帶也更加鞏固。

#### (二) 網絡政治惡搞：新媒體環境下的政治表達

新媒體環境下，網絡政治惡搞成為不少佔有社會資源較少的香港青年回應現實生活和社會政治的重要意見表達方式，並發展為一種典型的青年亞文化現象。所謂網絡政治惡搞主要是基於新媒體平台將原有的經典或流行作品進行解構和顛覆，在看似娛樂好玩的同時以滑稽、批判和諷刺的方式表達對嚴肅的現實生活和社會政治議題的切身感受和意願。

近年來，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和購房置業問題成為困擾香港青年的主要問題，並被視作是一些香港青年“走上街頭”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除了“走上街頭”這種激進方式，更多香港青年通過網絡惡搞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在這些問題上的不滿情緒。借助新媒體平台，這些惡搞歌曲、漫畫、視頻得以

裂變式傳播，成為煽動青年情緒、影響青年觀點的重要方式。以青年人為主要成員的窮飛龍就是一個因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等新媒體平台發表諷刺青年貧困問題的惡搞歌曲而迅速走紅的網絡惡搞改編歌曲組織。其成名曲《窮飛龍》惡搞改編自流行歌手陳奕迅的《陀飛輪》，“霎眼廿七歲，仍在求職三千蚊都殺”，“我的兩餐一宿不足，怎麼配佳偶”，“地價太高，呎價已逾萬，而蝸居怎去購”等歌詞以戲謔的方式道出了香港青年現實生活中面臨的問題和不滿的情緒，引起相當數量的香港青年共鳴。

鑑於惡搞對香港青年的吸引力，作為一種回應，近年來一些網絡媒體也開始通過這種形式來吸引青年。2015 年成立的網絡電視《毛記電視》就以惡搞無綫電視的節目為主要節目內容，吸引了不少青年關注。

### (三) 網絡政治群組：新媒體環境下的政治結社

網絡政治群組即以影響公共事務和決策為目的而建立各類互聯網群組，是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結社的新形式。Facebook 群組是其中的典型代表。Facebook 最新公佈的十年願景“幫助人們建設社群，將世界聯繫更緊密”也凸顯了 Facebook 在這方面的功能。事實上，設立 Facebook 群組，已經成為香港青年近年來發起議題討論和集體行動的標配。根據 Facebook 的統計，香港最受歡迎的 Facebook 群組都是 25-34 歲的青年群組。<sup>11</sup>

通過網絡政治群組，現實社會中缺乏組織連接、日趨原子化的青年個體得以再組織化。一方面，有共同興趣和訴求的香港青年通過群組積極線上交流意見；另一方面，則可能以此為依託發起各種綫下的集體行動。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激進“港獨”的聲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借助於網絡政治群組形成的。一方面，“港獨”畢竟不得人心，發起者難以在現實社會中有太多作為，只能通過在 Facebook 建立群組呼籲支持，其中常見的群組就有“香港人優先”、“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連線”、“香港旗飄揚”、“香港獨立運動”、“香港獨立同盟”、“香港建國軍團”、“香港民主共和國政府”、“反赤化、反殖民”等等。另一方面，個別激進“港獨”分子也通過網絡政治群組發起綫下行動。2013 年年底擅闖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的招顯聰和張漢賢就是“香港人優先”群組的核心成員。

### (四) 網絡政治動員：新媒體環境下的集體動員

網絡政治動員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環境與政治局勢下，動員主體為實現特定的目的，利用互聯網的技術平台在網絡虛擬空間有意圖地傳播針對性的信息，誘發意見傾向，獲得人們的支持和認同，號召和鼓動網民在現實社會進行政治行動，從而擴大自身政治資源和政治行動能力的行為和過程。<sup>12</sup> 近年來，網絡政治動員作為香港青年集體動員的新形式已經趨於常態化。不論是 2003 年“七一”大遊行、2010 年“反高鐵”運動，還是 2012 年“反國教”、2014 年非法“佔中”、2016 年“旺角暴亂”，網絡政治動員都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 2016 年農曆新年夜發生的“旺角暴亂”為例，這場由個別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的青年人為主策動的暴亂事件導致 89 名執法警員和數名記者受傷。事後超過 40 人被控一項暴動罪，這些人中除兩人年紀較長外，其餘都是 35 歲以下的青年人。因不滿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對涉嫌非法經營的街頭小販嚴格執法，暴亂發生前，社運人士劉小麗和本土民主前綫、學民思潮前發言人周庭等人分別

通過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呼籲市民晚上前往旺角一帶“捍衛夜市或惠顧小販”。之後，一批所謂本土派人士迅速到達現場，周庭等人不斷通過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直播現場最新狀況，呼籲市民隨即前往旺角支援，一些傳統媒體也開始跟進報導，其後大批人士集結到現場，數名本土激進青年趁亂衝擊在現場的警員導致衝突升級，最終釀成暴亂。

這一過程事實上也呈現出了香港青年網絡政治動員通常的鏈條。即首先在新媒體平台上發佈信息或設立議事群組，重在傳播信息、誘發意見，爭取社會關注；然後迅速出動，不斷通過網絡直播的方式把現場的情況再次傳遞到網絡上，重在煽動情緒、擴大影響力，維繫運動進行；最後，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議程互動，引起全社會和政府部門的關注。當然，整個過程不是完全綫性的，在每一個環節中都可能存在交叉進行的情況。

#### 四、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特徵

隨着參與形式的多樣化，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徵，主要表現在：第一，主體的平等性，參與者處於一個扁平化的組織中，雖身處同一行動，但又相互保持距離，互不代表對方；第二，目標的複雜性，主體的平等性和廣泛性決定了目標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同一行動的參與者目標可能大不相同；第三，過程的互動性，參與者既是主體也是客體，既是信息的消費者，也是信息的生產者；第四，表達的情緒性，注重和強調情緒的連結而非理性的論述，把人們連結在一起的往往是共同的情感體驗。

##### （一）主體的平等性：離群共處式的參與架構

扁平化、去中心化是互聯網組織架構的基本特點。作為新媒體原住民的香港青年亦處於出崇尚個性、抗拒領袖的階段。這二者共同形塑了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主體的平等性，即每一個參與者都是平等的主體，有參與者但往往沒有組織和領袖。即使有所謂“領袖”，對參與者也並無多少約束力，有學者稱之為“離群共處”的政治參與架構。<sup>13</sup>

以網絡政治群組和網絡政治動員動員為例，參與者並不需要一定加入某個嚴密的組織，只要認同相關的議題或行動，就可以以個人的身份參加進來，參與過程中亦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時退出。相應地，作為議題和行動的發起者與組織者的所謂“領袖”對參與者亦缺乏約束力。事實上，即使是參加同一群組或運動，也並不意味着參與者認同組織者。如 2014 年非法“佔中”後期，學聯院校成員相繼出現反對學聯的呼聲，批評學聯在非法“佔中”期間決策失誤，之後更衍生出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浸會大學相繼退出學聯的行動，最終導致學聯名存實亡。

總體而言，傳統的青年政治參與往往具有較強的科層制特徵，需要依靠領袖的魅力和嚴密的組織。新媒體環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參與主體之間更加平等，組織和領袖的角色有所減弱。

##### （二）目標的複雜性：多元主體參與下的目標衝突

參與主體的平等性和廣泛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參與目標的複雜性和多元性，這是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另一突出特徵。就投票選舉而言，一般認為青年是反對派和本土派的主要票源，

且近年來青年的投票率有所上升，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都支持反對派和本土派的立場和政見。除了一部分激進青年外，不少青年投票給反對派和本土派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對權威反感，認為體制內需要反對的聲音。就網絡政治群組而言，雖然群組建立意在吸引志同道合的人，但因為缺乏實質上的領袖，在具體議題乃至群組建立的目標上，成員之間亦時常發生衝突，這也造成不少成員主動或被動退出群組。支持“港獨”的“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群組就曾因成員意見不合，先是發言人及數名核心成員離開，之後發起人也退出了群組。就網絡政治動員來說，不同被動員對象參與的動機和目的更是不一而足，個體的目標往往被置於集體的目標之上，參與者也往往是隨性而來，率性而去。有些示威遊行甚至中途餓餓就跑到路邊就餐去了，完全把行動拋之腦後，餐後也不再繼續參加行動，這也造成了被動員對象群體的不穩定性。不同機構在統計參與行動人數時往往有較大衝突，除了其他原因，與這個情況也不無關係。

概括來說，傳統的青年政治參與因為科層化的體制，往往具有明確和一致的目標。新媒體環境下的青年政治參與主體更加平等，利益更加多元。同一群組或行動的參與者目標可能不同，同一參與者在不同的群組或行動中目標亦可能不同，這都決定了其目標的複雜性。

### (三) 過程的互動性：既是主體也是客體的參與過程

互動是網絡新媒體最核心的特徵。數位化研究的先驅尼葛洛龐帝在其《數位化生存》一書中就明確指出：“多媒體在本質上是互動的媒體”。<sup>14</sup> 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的政治參與過程也表現出極強的互動性特徵，並貫穿在其政治參與的各種形式和環節中。

在投票選舉中，一些青年候選人不僅利用新媒體發起政治眾籌，亦積極利用新媒體平台發佈其理念和觀點，及時與市民互動，並按市民的回應及時調整和優化政綱或選舉策略。以上文提到的朱凱迪為例，在聲稱因人身安全被迫棄選的周永勤宣佈退選的當晚，朱凱迪立即通過 Facebook 直播和粉絲互動，間接回應自身面臨的人身安全問題，引發大量關注，粉絲數量劇增，為其最後高票當選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網絡政治惡搞在一定程度上本身就是佔有社會資源較少的青年為了回應相關的嚴肅議題的一種互動式表達。一些惡搞歌曲和短視頻的創作者為了因應粉絲的要求，有時則會對這些惡搞歌曲和視頻進行再創作，以引起更多的情感共鳴。網絡政治群組更是有效的互動和交流平台。群組成員通過群組發表和交流意見，對相關議題進行持續追蹤和深入討論。網絡政治動員中，不僅是發起者參與行動發出號召，身在現場的人亦將運動現場狀況通過網絡新媒體進行直播，動員更多人的參與。即使身處外地也可以通過新媒體圍觀、轉發、分享，擴大行動影響力。2014年非法“佔中”期間，不少身處外地的香港青年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參與到運動中去的。

概括而言，傳統的青年政治參與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單向的，呈現出較強的被動性。新媒體環境下青年政治參與過程則呈現出雙向的互動性特徵。參與過程中，青年既是主體也是客體，青年不僅可以是信息的消費者，亦可以是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青年不僅可以是網絡政治動員的對象，也同時可以是網絡政治動員的發起者和組織者。這是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又一突出特徵。

### (四) 表達的情緒性：情緒連結下的青年政治表達

新媒體環境下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另一突出特徵是注重和強調情緒的連結而非理性的論述。包括網絡政治惡搞、網絡政治群組和網絡政治動員等政治參與形式中的表達往往都帶有強烈的情緒性，更

多是一種情緒的渲染，而非理性的論述和爭辯。把人們聯繫在一起的往往是一種共同的情感體驗，而非共同的理念和訴求。

網絡政治惡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佔有社會資源較少的青年在無力改變現狀的情況下的情緒宣洩，其最終能夠產生影響也有賴於觸發大眾的情感共鳴。例如前面提到的惡搞歌曲《窮飛龍》，主要是對置業難和收入低的不滿情緒的表達，而關於怎麼理性地解決問題並非其主要關切點。研究表明，全面性的議題轉帖到相關網絡政治群組中後往往變成了片面性的話題，群組成員討論時往往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不少群組內部討論的用詞也傾向激動、非正式甚至帶有挑釁的意味。在此情境下，情緒成為主導議題的主要變數，理性討論往往難以進行下去。網絡政治動員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情緒的動員。例如非法“佔中”一開始時，現場人數不多，事件升級的轉捩點出現在“警察打人了、警察要開槍了”式的表達在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上滿天飛後。儘管在很大程度上是謠言，但在這種情緒的帶動下，一時間現場人數迅速增加，事件隨之擴大。概言之，以往的精英式政治表達更加注重理性思辨。新媒體環境下的青年政治表達情緒性則更強，情緒對事件的影響力甚至超越了事實。

## 五、新媒體環境對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影響

新媒體環境不僅豐富了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形式，形塑了其新的時代特徵，而且對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內在邏輯乃至香港政治生態的深層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新媒體成為香港青年獲取政治信息和意見交流的主要平台，強化了群體極化和“沉默的螺旋”效應，深刻影響了香港青年的政治認知模式。第二，新媒體再造了香港青年個體的行動和組織能力，打破了先前由政團組織或政治機構壟斷的政治動員模式。第三，新媒體的興起使得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影響力跨越地域範圍，產生了全球性影響，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香港青年政治參與中的傳播模式。

### （一）沉默的螺旋與群體極化：新媒體對香港青年政治認知模式的影響

新媒體在香港的興起，一方面拓寬了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途徑，讓更多的青年人有機會參與政治；另一方面，從政治認知的角度講，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其偏見，加劇了其既有的政治傾向。如前所述，網絡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等新媒體正在逐步取代傳統媒體，成為香港青年獲取政治信息最主要的來源。多項實證研究表明，新媒體環境強化了沉默的螺旋與群體極化效應。

這兩種效應是傳播學的經典理論。簡言之，沉默的螺旋效應指群體壓力壓制了持少數意見者發表意見。當網民發覺自己的意見屬於“少數”或處於“劣勢”時，可能會為了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群體極化效應則是指觀點相近的網民一開始就有某種偏向，通過網絡上的相互影響，在群體的壓力下產生從眾心理，主觀傾向繼續偏移，失去了對信息的理智分析和判斷，最終群體性地形成極端觀點。

香港的網絡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尤其強化了這兩種效應。一方面，近年來新興起的網絡新聞媒體大多政治立場鮮明，傳統媒體所奉為圭臬的客觀公正全面平衡等新聞專業主義特質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人們出於本能更願意看那些與自身觀點一致的媒體消息，網絡新聞媒體實際上助長了這種可能性。另一方面，以 Facebook 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關注內容主要源於使用者個體的主動關注和社交媒體平台的演算法推薦。一般來說，使用者關注的對象都是和其立場和價值觀相近的使用者和內容，其

添加的好友的觀點多數都與其一致；演算法推薦則是收集使用者的狀態更新，包括其轉發的新聞以及點讚和評論等，並將這些資料轉化為相應的分數，由這個分數決定一條信息能否成為向該使用者推送的熱門新聞。這也意味着香港青年在社交媒體上接觸到的信息大多也是和自身觀點一致的。

兩者疊加實際上形成了一種馬太效應，讓不少香港青年的視野在不經意中更加偏狹和極化，尤其是一些激進本土青年接觸的只是個別激進網絡媒體和社交媒體專頁的言論，對傳統媒體或官方信息不聽不看不信，其思想難免會變得更為偏激，並進而反映在其行動中。研究已經表明，以社交媒體作為獲得公共事務信息的最主要來源的青年，更傾向於對香港特區政府持負面評價，對社會運動則多持正面態度。

## (二) 再造個體行動的能力：新媒體對香港青年政治動員模式的影響

傳統的青年政治參與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精英式的政治參與，大多數青年個體無法在實質上參與其中。新媒體環境則打破了先前由政團組織或政治機構壟斷的政治參與局面，現實社會中缺乏組織連接、日趨原子化的青年個體得以再組織化，有了切身參與的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再造了青年個體行動的能力。近年來激進本土青年勢力在香港的崛起，與此不無關係。一方面，他們借助新媒體平台發起眾籌，擴大知名度，爭取急於求變的青年選民的選票，以進入立法會等體制內機構，試圖實現制度化政治參與；另一方面，他們則借助新媒體平台呼籲支持者發起遊行、佔領行動，進行非制度化政治參與。

就投票選舉等制度化政治參與而言，新媒體已經成為選舉競爭的重要領域。激進本土青年多數是新媒體星球的原住民，對新媒體的運用極為純熟。香港第六屆立法會選舉中，7名本土激進青年的當選，應該說與其新媒體動員策略的應用得當有很大關係。儘管因在宣誓中褻瀆基本法，這些激進青年多數已經被相繼褫奪議員資格，但其在選舉中所運用的新媒體動員策略不能不引起重視。就遊行、佔領等非制度化參與而言，以往的行動不但需要嚴密的組織，且需要具有個體魅力的領袖的帶領。新媒體環境下，這些都不再是必須。建立一個網絡群組或專頁，在 Facebook 上發起號召，就可能發起一場影響全港的遊行乃至“佔領”運動。2014年非法“佔中”、2016年旺角暴亂，Facebook等社交媒體都在動員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譬如非法“佔中”發起日當天下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通過其 Facebook 專頁發佈集會通知，兩個小時學校圖書館就集聚了過千名學生。

## (三) 跨越時空的全球性影響力：新媒體對香港青年政治傳播模式的影響

以往青年政治參與的影響力往往局限於香港一地範圍內，新媒體環境則把這種影響力帶到了全球範圍內。一方面，新媒體內容的傳播沒有地域限制，其傳播範圍在理論意義上可以到達世界範圍內的任何一個角落；另一方面，全球範圍內的人都可以通過新媒體平台參與進來，所謂圍觀就是力量、轉發就是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了傳統的政治傳播模式。

內容傳播跨越時空是新媒體自身的特性，以往研究也進行了深入論述，這裏不再贅言。全球範圍內的人可以通過新媒體參與進來則值得一提。事實上，在一定意義上，使得議題和行動真正得以發酵和在新媒體上形成裂變式傳播的正是這些“鍵盤戰士”的參與，他們雖然不在現場親身參與，卻通過新媒體平台持續轉發、評論，對話題討論的深入、行動的持續維繫發揮了關鍵作用。2012年“反國教”運動真正開始發酵正是緣起於“中國模式”教學手冊內容在網絡上被廣泛傳播並惡搞之後。在新媒體



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香港青年是典型的“互聯網行動主義者”<sup>15</sup>，他們更熱衷於社會運動並且在社會運動中更積極、更有創意地使用和生產新媒體。<sup>16</sup> 這種新型的政治傳播模式，也是新媒體環境對香港青年政治參與帶來的又一突出影響。

## 註釋：

- <sup>1</sup> 陳鍵興、趙博、張雅詩：《習近平考察香港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暨青少年綜合訓練營》，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6/30/c\\_112124385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6/30/c_1121243854.htm)，2018年3月1日訪問。
- <sup>2</sup> 馬偉傑、周展梁等：《2016年度新聞與社交媒體使用行為調查》，載於《傳媒透視》，2016年第9期。
- <sup>3</sup> 見世界互聯網使用統計網站：<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asia.htm#hk>，2018年3月5日訪問。
- <sup>4</sup> 相關數據載於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網站：<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press/main/year/datatables.html>，2017年12月20日訪問。
- <sup>5</sup> 殷楠、蕭豔萍：《香港網絡新聞媒體的發展現狀及前景》，載於《港澳研究》，2016年第4期。
- <sup>6</sup>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61號報告書：新媒體的使用情況、執行贍養令的情況》，載於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網站：<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12016XXXXB0100.pdf>，2018年1月6日訪問。
- <sup>7</sup>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二零八)：青年使用智慧手機情況》[EB/OL]，載於香港青年協會網站：[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7/09/P208-Full-Report-for-Web\\_chi\\_20150321-1.pdf](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7/09/P208-Full-Report-for-Web_chi_20150321-1.pdf)，2018年2月21日訪問。
- <sup>8</sup> 《“香港青年的社交媒體使用及政治參與意見”調查：調查結果》，載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網站：[http://youthstudies.com.cuhk.edu.hk/wp-content/uploads/2017/01/press-release\\_CHI.pdf](http://youthstudies.com.cuhk.edu.hk/wp-content/uploads/2017/01/press-release_CHI.pdf)，2018年2月21日訪問。
- <sup>9</sup> 同註7。
- <sup>10</sup> 蘇鑰機：《社交媒體成為第四影響勢力》，載於《明報》，2014年11月20日，第A40版。
- <sup>11</sup> 韓姍姍：《從擅闖駐港軍營看“港獨式”激進運動：特徵、原因及危害》，載於《港澳研究》，2014年第1期。
- <sup>12</sup> 婁成武、劉力銳：《論網絡政治動員：一種非對稱態勢》，載於《政治學研究》，2010年第2期。
- <sup>13</sup> 黃偉豪、陳思恒：《離群共處的港式政治參與》，載於蘋果新聞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50413/19110484>，2018年3月20日訪問。
- <sup>14</sup> [美]尼葛洛龐帝：《數位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7年，第163頁。
- <sup>15</sup> 閔大洪、劉瑞生：《香港“佔中”事件中的新媒體運用及思考》，載於《新聞記者》，2015年第1期。
- <sup>16</sup> 林仲軒：《表演認同作為其他途徑的政治：澳門網民的實踐經驗》，載於《新聞學研究》，2017年第2期。